

我對蔣公的感戴與懷念

葉 醉 白

前 言

先總統 蔣公崩逝，天下震悼，四海同悲，彼時我正旅行洛杉磯、紐約之間，爲之失聲飲泣者多日。

此文初稿，即撰于紐約旅途之中，以其時報章雜誌，悼念、領袖文詞，不可勝載；而個人天性，又最不爱趕熱鬧，故不敢將之及時奉陳於萬千讀者之前。

今時逾半載，人們大都遵循遺訓，把感情轉爲理智，化沉痛匯爲新生。而我這篇蕪文在此時投之予擁有廣大讀者之中外雜誌，謹願對予領袖蔣公之偉大，增添另一角度的認識，敬祈讀者指教。

睿智卓識不棄芻蕘

在全世界軍人中，打仗最多的，是我們中國人。中國人最愛和平，爲什麼變成打仗最多呢？其一曰：日本侵略中國，犧牲到了最後關頭；其

一曰：中共乘機坐大，要將三民主義的革命，變爲赤化全國。兩者都迫使愛和平的中國人，在偉大的 蔣總統領導之下，無法逃避的肩負起雙重的革命戰爭。

在此雙重的革命戰爭中，我們體認到 蔣公是一位最卓越的大戰略家，始終把握用空間換取時間的對日抗戰的大戰略；尤其深切了解中共的「狡性」之爲害，遠超過了「暴性」之日本軍閥，所以忍痛而任怨的定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大戰略，奈燕雀不知鴻鵠之志，衆敵偏可成雷。第一大戰略之貫徹，贏得了抗戰的勝利；第二個大戰略之未能實現，招致了戡亂的挫敗。這就是中國國民革命大戰爭的大戰略的成和敗的大關鍵，誰曾替 蔣公赤胆忠心，肩挑日月，而尚未能旋轉乾坤的隱痛，爲之一語道破啊！

因爲 蔣公是一位大戰略家，所以能洞察機微，虛懷若谷，重視高深軍事哲理的重要性。這裏，請讓筆者報告一則 蔣公不棄芻蕘，特別垂察本人所提供的軍事癥結的故事。

民國三十九年，我以師長職臨時調訓于陽明山莊研究院，受訓時間只有三個星期。在第二個週末，奉通知兼院長 蔣公要對各同學個別談話。可是剛巧有師內重要官員從宜蘭來向我報告緊急事務，待這官員走後，距 蔣公個別談話只有卅分鐘了。我急急忙忙底用鋼筆寫了兩點有關對中共作戰的軍事癥結問題，連稱呼都來不及寫了，只寫的是：「意見提供之一」，「意見提供之二」原文如左：

意見提供之一

「共匪自江西以來，因爲兵員缺乏，武器窳劣，說不上軍事科學，故以我國古代的軍事哲學爲基本思想，講求奇正虛實，講求運用變化，寓生活于戰鬥，寓訓練于戰場，翻陳出新，狡詭虛詐，神出鬼沒，極盡戰爭藝術化之能事。故其戰術思想，是基于軍事哲學的反覆實踐而形成統一的一套。

「我軍數十年來，追求軍事科學，于是學德國、學日本、學美國，東抄西襲，各鳴其是，頭腦

先入主觀，門戶各不相下，對外國的軍事科學未得皮毛，反將自己的傳統軍事哲學拋棄無遺，逐漸變成死的訓練，死的指揮，死的戰法，而無戰術思想可言。」

意見提供之二

「今日軍事之失敗，在將領不在士兵，在全體不在個體。以個體言，匪之師長，不比我之師長優秀，匪之團營連長，不比我之團營連長優秀。然匪之所以勝，除組織力外，另有兩個法寶：其一為統一的戰術思想，其二為統一的戰鬥作風。以言戰術思想，如林彪之一點兩面，所有共匪各級指揮官甚至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個整套的體系。以言戰鬥作風，匪則不打則已，一打就猛，一打就狠，一打就硬，而且是殲

滅性的。我則應付命令，敷衍任務，投機取巧，避重就輕，而並無戰鬥意志與戰鬥目標。故今後欲戰勝敵人，必須建立統一的戰術思想，與統一的戰鬥作風，使其全體化，整套化。」

真萬想不到，即在第三週的星期一國父紀念週週會上，蔣公訓話，第一句就說：「我在上星期五召見了研究員（受訓時統稱研究員）葉錕同志，他對我提供了剿匪戰術的意見，我非常佩服，非常欣慰。（後來列入訓詞，並無非常佩服句）現在我將他的原文對大家唸一遍。」

蔣公于唸完我的兩項意見後，曾作約一小時以上的闡述，後來且列入「總統訓詞」名曰：「今後軍事教育的方針」，頒發三軍研讀。在此以外，蔣公還誇獎我另外有幾點已經在雜誌發表



民國三十九年本文作者任國軍師長，總統蔣公蒞臨師部親校時留影。

過的文稿，記得就中有兩點頗關重要的，第一點指出敵我戰略目標的差異。我軍的戰略目標在於「爭奪地」，而共軍的戰略目標，在於消滅我之「有生力量」。第二點則指出「我軍每日行軍三四十里，共軍則為八十至百餘里」，因而形成了「我打匪打不到，匪打我不脫」。

于此，必有人會發生疑問，你區區一師長，有什麼軍事見解，何不向你

直接長官陳述，而必須向最高當局提出呢？這也真是不得已，除了睿智卓識的蔣公以外，卞氏之璧，可能視同頑石，伯牙之彈，誰識流水高山，此其一。像這樣大的軍事癥結，要從根本改革，要整套超越敵人，除蔣公以外，誰有這分力量。嗚呼！億萬人哭蔣公，是爲了「同悲」，我的哭蔣公，除同悲之外，還加上千載難逢的「特達逾分之獎誘的「個悲」啊！

當蔣公在週會上宣讀我的意見時，我自己當然夢想不到，別的同學更感驚奇，散會後，即有幾位同學和我開玩笑。一個說：「葉某不放砲則已，一放即響。」一個說：「從民國十七年以來，只有學生讀總統的訓詞，從來沒有總統反轉來讀學生的東西」，我很嚴肅的告訴他們，你以爲向總統提供意見，是爲了出風頭嗎？老實說：大陸失落了，假使真有真知灼見，一個連長也不妨提出來；假使能有別人提出來，我最好是藏拙。老實說，從很多戰場的親眼目擊，一些官高職顯的方面大員，平時睥睨一世，臨危束手無策。「官」之一字，在我心目中，早已成爲一種模糊的意識，不知那些「官」是代表榮耀，還是象徵恥辱，大家倘憑良知捫心自問，恐怕恥辱多于榮耀，但倘若你真正是革命者的話，你的大官只是責任而非榮耀。說句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話，我做師長時，有地位極高的因私事到我防區而我未予接待，有某直接長官「做壽」，獨我一人不送禮也不去敬酒，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李太白華陰縣上倒騎驢，我祇是革命戰士，本質與陶李風流不同；但我也大概有點類似的「輕官病」。

因為我把官的標誌，不是放在他的職階上，而是放在他的革命不革命上。因此，我確無追求高官顯職的興趣，真正想在官場「青雲直上」的話，也決不會在我年青正作團長時便開始學畫了。附帶報告的，我做上校時，便立定我軍職的止步線，那就是階級到少將為止，職務到師長為止。（自知才僅能任此）後來還在金門代理一段時間的軍長，算是超出「預算」。

那次蔣公在週會誇許以後，有一天，早操時，好心的院中主任萬耀煌將軍，走到我身旁，輕聲的告訴我：「院長很重視你，下手令調你的自傳及履歷看。」我當時心中真是一點感激都沒有。我感激蔣公的錯愛，但我並不要在軍職上求上進。倘使我所提供的那些意見，果有利于今後擴大之形成一整套的較毛共棋高一着的戰略戰術，就真算我出生入死殫精竭慮在許多大戰場上發掘了的卞氏璧，價值豈在十五城之下。至于官，實在是人才濟濟，何待于我這最不合做官的去濫竿呢。

在此請中外讀者特別注意，我在提供意見中所指陳共匪瘋狂好戰及其僥倖獲勝，乃係三十七、八年間一時之情況，大陸淪陷後，經過「三反」「五反」文化大破壞，匪軍戰鬥意志之消沉，共幹離心離德，與復興基地國軍戰志昂揚，尤其近年來，蔣院長遵照「總統蔣公訓示勤政親民，整軍經武，敵消我長，真有天壤之別。

戰爭藝術化勝科學化

七年以前，我在吉隆坡藝術學院講演，忽然

有一個學生問道：「越南戰爭，美軍動員陸海空軍四五十萬，何以不能擊敗南越區區游擊隊？」我不加思索的回答說：「這便是東方戰爭藝術化，玩弄了西方戰爭的科學化」。（這兩句話，被記錄發表在「中國報」，頗獲文化界欣賞）。這話，說來很簡單，也有大多數人不相信。但其中確實包涵很深的哲理。真正說來，科學兩字，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狹義的機械、火力、原子彈，或所謂電紐戰爭等，所以蔣總統有「科學的學庸」的講詞，這是說大學中庸那樣古老的典籍，便大有科學在其中了。

中國歷史上的名將，是大藝術家，也就是大科學家，他們懂得科學是死的，藝術是活的，所以把藝術置于科學之上。因為只有藝術，才能「以寡擊衆」，才能「以少勝多」，才能「化敵爲我」，才能「變無爲有」，才能「以迂爲直」，才能「以退爲進」。這樣說還是不夠明白的，現在我們要問，趙括四十萬，何以一戰坑于「秦壁」？符堅「投鞭斷流」，何以「草木皆兵」？曹操赤壁八十萬衆，何以只逃出十八騎？坦寧堡之役，德國第八軍本已打敗退却，何以換了與登堡去指揮，轉成反包圍，一晚俘俄軍十四萬？笨牛不是科學，但火牛陣成爲千古名戰，確堡是古代老法，却迫得毛共流竄兩萬多里。從這些人所共知的戰例，就不難明白戰爭科學與戰爭藝術之共通性與迥異性。我敢於說，戰爭科學是應該置于戰爭藝術之下的，拋棄了戰爭藝術而醉心于戰爭科學，是不懂得哲學性更重于科學性，是迷信物質有限力而忽略了心智的無限大用。（再推

而上之，即更是不懂得中國文化）。尤其數典忘祖，把中國歷代的名將如孫子、諸葛亮、王陽明、戚繼光以至我們的蔣總統，都是成功在戰爭藝術上，而不是成功在戰爭科學上，忘記了這一點，無藝術又不科學的糊塗仗，是決沒有僥倖的勝利的。

越共游擊隊爲什麼會懂得「戰爭藝術化」呢？他們到底是東方人，多少偷學了中國古代的軍事哲學，由此而摸透了美軍的刻板的科學戰，他們幾點鐘上飛機到戰場，幾點鐘由戰場到酒吧，炸大使館炸飛機場造成心理上的恐怖，用種種方法煽動美國國內反戰示威，用「三通戰術」（地下通、房子通、樓上也打通）把自己變成泥鰍，使美軍的空軍和坦克失其威力，把「和談」擺在巴黎，使巴黎成爲他們宣傳的總站而痛詆美國，造成全世界的錯覺等等，就憑這幾點小小的「藝術」，就使超級強國五十萬科學化的大軍，毫無施展。這不是「東方戰爭的藝術化，玩弄了西方戰爭的科學化」嗎？

有人說，越戰的錯誤，是當初美軍作繭自縛，「打有限度的戰爭」。要不然，早已掃平越南游擊隊了。不錯，須知連打有限度的戰爭在內，也就是因爲不懂戰爭藝術之故。

又有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的「戰爭科學化」不打得挺好吧？這就要分析各種情況的不同。第一、那時德軍已成強弩之末，且陷于三面作戰；第二、歐洲平坦地交通網四通八達，最適合于閃擊戰，而越共則利用森林地帶。第三、德軍指揮官也不懂戰爭藝術。這些道理，就叫戰

爭規律的不同。同樣的道理，在我們，北伐不同于抗戰，抗戰又不同于戡亂，也就是戰爭規律的差異。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了解什麼叫戰爭規律，更不了解每個戰爭規律的特殊性。試問如何指導戰爭，更怎樣會使出戰爭藝術化的本領呢。

這種觀點，仍然和我三十九年向蔣公提供的意見，在思想上是一貫的。我敢說，美國的軍事教育、軍事思想、參謀作業如一仍舊觀，毫無改變，（觀于韓戰經驗未能絲毫改變之于越戰，證明美軍戰術毫無改變。）可能成為僵屍式的科



本文作者於民國五十五年出國前蒙
蔣公召見並賜合影留念。 總統

學戰爭，難以制勝于魔術化的戰爭的。因此，個人認為我們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有數千年的軍事哲學，有數千年的戰爭大藝術家。而美國除那點戰爭科學以外，是茫然不知戰爭藝術那一面的，把我們戰爭藝術化，加之於美國戰爭科學化，把僵屍式的戰爭科學神而化之成為戰爭藝術，可說是現今世界上最重大的課題，也是最大的學問。

萬應靈丹致良知

我讀過蔣公訓詞很多，但最使我感動而為目前國家所最迫切需要的，厥為蔣公提倡的「王陽明致良知」哲學。我自己很早時也讀過王陽明「傳習錄」，就有很深的感觸。（我做團長時就管書王陽明「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那有工夫說空話，管閒事」為座右銘。）

中華民族是一個高智慧的民族，這種高智慧用之于善則盡善，用之于惡則大惡。有屈原之善，而有靳尚之惡，有岳飛之善，而有秦檜之惡，這是史不絕書的事例。由于善人不屑與惡人鬥，于是善者常為惡者所扼所屈所敗，于是反給惡人以鼓勵，以擴張，而國家遂不免長期受禍害。中國五千年史，何以只有足稱的文景貞觀之治，就因為善不敵惡，民族的發展力在不斷自我斷喪之故。

蔣公目擊以國父之偉大，倘且有陳炯明之叛變，及其自身革命過程中所遭遇各式各樣的阻力，故繼國父苦心焦

思發明「知難行易」哲學之後，蔣公更苦心焦思提倡「致良知哲學」。

良知，也可說是非常抽象的，既看不見，又摸不着，而且是無定限的。救孩入井，是良知；拾金不昧，是良知；見義勇為是良知。而最大良知，則為「立救國救民之大志」，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這是國父與蔣公最顯著之模楷。但必須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道高一尺變為一丈甚至萬萬丈，要魔高一丈縮為一尺一寸，進而化為同道同志，似乎祇有致良知一途。因為不在致良知下功夫提警覺，則良知日趨于「鈍化」「腐化」「惡化」而不自知。于是「私心」「偏心」「欺心」「疑心」日益滋長。而原來不是靳尚而變成靳尚，原來不是秦檜而變為秦檜，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則致良知一事，寧非「萬應靈丹」而何。

其實，講到致良知，其神髓只在「誠」「詐」二字。

有兩句成語，誰都知道的，那就是「不誠無物」，與「兵不厭詐」。可是「不誠無物」是對己用的，「兵不厭詐」是對敵用的。但神妙的是，必須先堅乎「對己之誠」，然後才能敏乎「對敵之詐」，有諸葛亮的鞠躬盡瘁乃能妙用之于「空城計」，妙運之于「死諸葛亮走生仲達」，妙用之于「七擒七縱」。有岳武穆之精忠報國，乃獨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奇計百出，玩弄金兀朮于股掌之上。這是說明了先有「對己之誠」，才能產生「對敵之詐」，而「對敵之詐」，實基于「對己之誠」。

但很多人却把聰明用錯了方向，對自己應該「誠」的而反去用「詐」，由此而產生了「陽奉陰違」，「投機取巧」，「保存實力」，「化公為私」。而對敵應該用詐的，因詐術都用在自己的長官同事和部下，心智已枯，平時對敵人不加研究，臨大戰即墜入敵人詐網之中，無志節者遂只有向敵輸「誠」一途了。

向最危險方向前進

蔣公訓示，另一使我服膺的，是「革命者應向最危險方向前進」，而進一步又闡明「最危險方向，即是最安全的方向」。區區如我，不比達官顯宦，有豐功偉績可資宣揚；但革命一詞，似乎不是以職階來區分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那一位是上將中將呢。

因此也曾有幾點格邊 蔣公訓詞「向最危險方向前進」的小故事，報告于讀者之前，幸勿見哂。

1. 不願做不打仗的副團長 民國廿六年，我任九十四軍一八五師一〇八九團副團長，駐武漢。忽奉令將此團改為武漢警備團，全團官兵皆大歡喜，因為警備團直隸警備總部，待遇好，服裝漂亮，生活安定，且不必參加野戰。獨我一人以為對日抗戰，就在與敵拚戰到底，乃獨自請求准予回到新的一〇八九團做副團長，俾不失打仗的機會。

2. 補充團擺空城抵禦日寇 民國廿九年我被調任九十四軍第一野戰補充團團長，剛接新兵不久，且尚有三分之一新兵未到。是年夏，日寇乘

我江防軍主力深入武漢敵後掃蕩，乃逞其狡計，蹈瑕履隙，乘虛而入，挾雷霆萬鈞之力，突襲宜昌。宜昌之危急，何待言喻。我補充團原駐「大橋邊」，距宜昌南約卅華里，在作戰以前，奉江防部命令，要我團速開後方秣歸，脫離戰場。（因上峯知我國係新兵且不到兩營，更乏充分槍彈），但我以為國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昌為陪都大門，一兵一卒，都應投入戰場，豈可開去後方，眼看宜昌亡而我獨生。乃即上書郭司令，請准本團參加保衛宜昌大戰，雖力量微不足道，但士氣甚旺，願全團壯烈犧牲，以盡軍人天職。蒙郭司令鑒其愚誠，先命開進前方在土門壩沈家店担任廿五里正面外圍警戒。殊不知小小的警戒部隊，却變成前方某某兩個師退却的掩護者。旋即奉郭公電話指示先行渡江佈防，不久即成為宜昌陷敵後與日寇隔江對峙的大正面。兩營新兵任七十華里（從安順廟直到江花溪）的防務，實際上等于空城計，我乃將團部也推到江邊，以激勵士氣，連通信排也作了對空警戒。（日機飛得極低）一次，我目視日軍便衣隊數百人泗水渡江作試探，我即親自指揮機槍猛烈掃射，日軍泗水隊半數傷亡，半數逃回。並設計在江中心一小島名叫「西壩」，利用昏夜捕獲日寇三名。從此盤踞宜昌之日寇主力，即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國于守禦四十三天後，才有友軍一個師來接我兩個營的防地。

3. 泥菩薩過江，一師勝十餘師匪 民國卅六年冬，我一九八師于解救我第九軍之圍後，第九軍由海路他運，而四個縱隊加上三個獨立師之共軍共十餘師緊跟本師之後，要吃掉我這在膠東有勝無敗的一九八師。可是本軍軍部帶另兩個師又在海陽被圍，奉 蔣公之命，又要本師經過四百華里匪區，趕至海陽解圍。前有數百里匪區，後有十多倍匪軍跟踪，而 蔣公之命又必須遵行，真有「泥菩薩過江」之感。此時我的計劃，不宜在行軍狀態中同匪打，而要選一與我有利之地形，再加以巧妙的陣地組織，和跟踪之匪決戰取得勝利後，再去解海陽之圍，（因海陽有海軍援助，且可由海面撤退）。後來果然運用機智，誘匪于不利地區，我不作一般指揮官之笨伯，把一師聚集一地，而將三個團分置三村，構成三角陣地互成犄角之勢，讓匪攻了十天十夜，傷亡大而師老無功，終於第十天夜半偷偷的全部撤退。我在第四天便算定匪在一定時間內非撤退不可。（根據匪軍「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還很輕鬆地在十萬匪軍包圍圈內畫了幾匹馬。）

這個戰役經過很複雜，也很神奇，我所以應付裕如，完全得之於 蔣公早年在軍校以及各訓練機構之訓導啓迪， 蔣公諄諄訓誨之恩德，畢生難忘。

4. 洞察機微，兩度建議。民國卅七年夏，我奉令調任在東北之新一軍參謀長，親友們都勸我不可去，他們說：「東北已被包圍，好一些人都活動調回關內，你還去送死！」我慨然說：「假使我自信有幾分軍事天才的話，我就應該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後來我到職不到三月，而遼西會戰起。當廖耀湘兵團徘徊于彰武新立屯間，我就預覺到 蔣公夾擊錦州林彪主力，一舉扭轉東北危局的大戰略，會被戰場司令官誤解，甚

至招致覆敗，于是很苦心的兩次向軍長建議，請他轉向兵團建議，必須向錦州猛進，痛擊林彪，以解錦州之圍，奈未能上達。後來果然招致了嚴重挫敗而自身整個兵團被圍。被圍以後，廖耀湘在一師部召集緊急會議，衆將失神失智，無一發言者。我乃慷慨陳詞，（此時廖實不知我居何職），陳說「被包圍沒有關係，可調整態勢，構成四十五個團據點，與之決戰，一週後轉移攻勢，仍可殲滅頑敵，挽救整個東北，並舉山東之南麻臨朐兩戰役，都如此『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我之作此建議，一則因羣龍無策，一則怕大家因畏匪而胡亂突圍。當時廖曾採取了我的意見，尚能貫徹下去，轉敗爲勝實非難事。奈當晚衛立煌總司令用十萬火急電報限令各軍昏夜突圍，五個精銳軍于一夜之間而解體。

我一生經過戰役太多，舉此四例，無非是說明我遵循 蔣公「革命者應向最危險方向前進」這句訓詞而一一的去實踐。我那時不知道致良知哲學，但我在軍校人生哲學上對「人生行爲，求其應該」一語，印象極深，且應用之于實踐，實際上「應該」二字，與「良知」二字可說是相近似的，不過良知而加一個「致」字，這便是大功夫了。據我在無數戰役所體會，團營連長以至士兵都是非常純潔的，也大都會遵循 蔣公訓示去實踐的，壞就是壞在那些大官。官大了，不知以爲知，不能以爲能，人不敢做他也敢做。只要瞞到蔣公就行。所以變成了「誠」「詐」顛倒，變成了轉勝爲敗，而結果是個個都沒有錯，大陸沒有了，不知是誰的錯！

由于這些累積的憂憤痛鬱，大大影響了我性格上的變化。且因刺激過多過深，使原已健忘的頭腦變成失憶症，而性情也變成很容易衝動。

自大陸轉進到復興基地台灣以後，台海一時無戰事，而我這種性格的軍人，只能合用于戰場，不打仗便覺不知所爲。且身體因做團長時與士兵同甘苦，冒雨行軍，（有雨衣不穿，因有些士兵無雨衣之故）一連三天，背上患了嚴重的風濕病，故從金門代軍長按期調防返台以後，便決心提前作志願退役。

奉准退役後民國五十五年秋，我因將開始出國，感念 蔣公往時特達之知，請謁 蔣公辭行，當蒙于九月十五日召見， 蔣公先問我預備到那些國家，繼問「你退役後專門畫馬？」我答：我雖然專門畫馬，但在心理上，實在是軍事戰場

的延長（我的青田音恐此一句未被 蔣公聽懂）

蔣公又問：「你這次出國，有那些人幫你的忙？」我萬想不到 總統會有此一問，旋答：「我此次出國是自費的，沒有任何機關幫忙。」蔣公說：「這樣好了，你在海外有什麼困難，可以寫信給我，我會幫忙你的。」最後一句幾乎是一字一字的說的，而且語氣很重，使我感動得連一個「謝」字都說不出來。

事後，我打電話給秦孝儀先生（召見時秦先生在座）我說：「想不到 總統對我這麼好」，秦先生說：「總統向來都對你很好的。」

回憶自考入軍校以來，蒙 蔣公親教培植，深恩厚澤，永銘五中，今後唯有加倍努力本位工作，聯繫海外僑胞，追隨邦人君子，消滅共匪，光復大陸，告慰 蔣公在天之靈。

編輯報告（一）

編者

讀。

△本期出刊，適值故總統蔣公八十九歲誕辰紀念，承抗日名將大藝術家葉群白將軍寄來「我對蔣公的感戴與懷念」，縷述 蔣公虛懷若谷，重視部屬意見的動人故事，情文並茂，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名教授敗學權威現任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李新民博士，有一篇懷舊憶往的佳構，交由本誌發表，是爲「懷念周綸閣（鴻經）師」，情文並茂，感人至深，師生情誼，純摯真誠，思慕之情，流露於字裡行間，值得一讀再

△省立台中高級農校前校長唐秉玄先生，功成身退，現正從事著述，唐先生爲台灣教育界元老之一，亦爲抗戰後期參與策劃台灣光復後教育接收並爲首批來台接收官員之一，爲紀念台灣光復三十周年，特撰「台灣教育接收回憶」，交由本誌獨家發表，全文有許多軼聞掌故，內幕祕辛，是一篇既有歷史價值，可讀性亦強的佳構。

× × × ×